

# 牛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亚历山大·莫里森： 如何从南亚研究者转型为中亚历史专家

施越

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定位

文汇报：首先，让我们从您的学术兴趣谈起。在您的牛津大学官网个人介绍中，您将自己描述为“一位研究帝国和殖民战争的历史学家，尤其关注沙俄统治下的中亚地区”。您能否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说明？您具体从事哪些领域的研究，又是如何对这些研究领域产生学术兴趣？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想我对帝国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的学术生涯的开端。一开始，我的研究更侧重于印度而非中亚。这一现象在英国是很普遍的，因为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有着很强的南亚研究传统，南亚语言的学习资源也相对容易获取。因此，我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论文都着眼于印度史。我对印度感兴趣的第二方面原因是我曾在印度的中学和大学任教一年。此外，如果追溯到更远的时候，我的祖先，即我祖母的家人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住在印度。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我的兴趣。

我在学校学习俄语的经历则涉及另外一部分家庭历史背景。我的父亲是路透社的驻苏联记者，也是一位苏联研究专家。他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俄语和法语，后任职于路透社。他在苏联工作了7年，并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担任莫斯科分社社长。所以我实际上成长于莫斯科，曾在那里生活了5年。因离开苏联时年纪还太小，我不记得太多事情。但印象中我的父母在家里都讲俄语。我就是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我的父母鼓励我学习俄语。但一开始，我对此是抗拒的。一段时间之后，我意识到俄语是一门有趣的语言。现在我觉得在中学阶段学习俄语是非常幸运的一段经历。

当我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并投身学术事业时，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我当时可以继续从事印度历史的研究，但印度史这一领域实际上非常“拥挤”，诸多成



就卓越的学者在此领域耕耘。那么为什么我不去研究俄国殖民主义呢？我掌握俄语，不运用这一技能是很可惜的。我认为俄国最有殖民特征的地区是中亚，那是我一直以来在阅读旅行读物时深受吸引的地方。因此，我决定进行俄国中亚殖民统治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对比研究，并以此为题撰写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关于这一主题，最初的研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在俄罗斯接触到的人所引发的。他们坚称俄罗斯从未有过殖民政策，所有地区都是自愿加入俄罗斯帝国的。这与英国殖民主义不具可比性，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那么，检验以上说法的一种方式是比较，判断二者是否具有相似性。事实上，我发现它们有着相当多的相似之处。显然，俄国的殖民政策也有其独特之处，与英国的殖民政策存在差异，但它们之间的差异绝不会大过英法两国殖民政策的差异。所以以上也是我对这一地区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文汇报：还有别的原因？

亚历山大·莫里森：在上述几方面原因之外，我对殖民战争和军事史的兴趣与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定位也有很大关系。我研究帝国已有较长时间，而近年来逐渐对军事史产生兴趣。对于后者的兴趣实际上是由前者引发，因为俄罗斯在中亚的统治方式基本上是军事统治。当时中亚地区大部分省份由沙皇俄国陆军部管辖，官员大多为俄军军官。虽然这在英国殖民政策中也很普遍，但俄国的军事统治更为体系化。如

近日，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研究员、历史系现代战争史副教授亚历山大·莫里森(Alexander Morrison)来到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参加“俄罗斯‘国家建构’路径的选择”工作坊，《文匯學人》特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采访了这位英国著名中亚近代史专家，请他谈谈自己投身中亚历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并介绍西方学界南亚和中亚研究领域在不同学术体系下呈现

的旨趣差异，以及他的忧虑——需要避免中亚历史书写成为某种全球史写作的附庸。

亚历山大·莫里森曾于2014至2017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他最近完成的《俄国对中亚的征服，1814—1907年：关于帝国扩张的研究》一书，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整理/马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果你想要了解俄国的殖民政策，你必须了解俄国的军队构成、制度文化、军官队伍、训练体系和相应的思想意识等等。我即将完成的最新著作名为《俄国对中亚的征服，1814—1907年：关于帝国扩张的研究》(The Russian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1814 - 1907, A Study in Imperial Expansion)。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军事史。我需要去研究燧发枪、枪支口径、不同火器的使用年份等细节问题。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定位是研究战争和军事史。您可能了解过，在学术体系中，很少有学者获聘的教职定位是中亚历史。美国的大学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所以还能见到有学者以中亚历史教学和研究为职。但是在英国，本科课程很少涉及这一领域。因此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被定位为现代战争史。我在牛津大学为研究生开设军事史课程，同时指导这一领域的博士生。当然，牛津大学的同事们也乐于我在中亚历史方面的专长和兴趣，因此我能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

接受极为漫长而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这一终点

文汇报：正如您的第一部专著《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1868—1910年：与英属印度的比较》(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1868 - 1910. A

Comparison with British India)书名所示，您在南亚历史研究方面着力颇多。据我所知，在英美学术体系中，南亚研究与俄国研究有着很大差异。您在从南亚研究者向中亚历史专家转变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什么困难？您如何体会英美学界这两个学术领域之间的差异？

亚历山大·莫里森：是的，的确存在一些困难。这两个领域有一些交集，其中一点是，波斯语对于这两个领域而言都是重要的研究语言。无论你想研究的是中亚还是印度的前殖民时代历史，波斯语都是这两个区域的官方语言。尽管也有一些次区域使用其他语言，但波斯语在两个区域内都是最有用的语言，尤其对于书面材料而言。

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有着很不同的文化。南亚研究者倾向于左翼，他们常常对东方唯灵论观点感兴趣。这一领域深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从伯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到后来的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他们都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在美国的南亚研究领域主导多年。而从事俄国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冷战时期成长的学者，因此更倾向于右翼。当然，这种划分大致适用于30年前，现在已经过时了。但这一文化层面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以人类学为例，俄国研究者通常不注重田野调查，因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开展实地调研，也不被允许进入档案馆工作。所谓美国“苏联学”很大程度上是猜测工作。实际上，美国的苏联研究常常是在重复苏联学界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并完全依赖于从苏联获

得的书面资料。与之相反，南亚研究者则可以实际访问对象地区，对英国殖民时期的行政统治史、财税史、军事史、农业史、社会史等子领域的历史进行大量开创性的研究。我对这些领域都有着很大兴趣。这些研究在60年代至80年代初已经完成。

俄罗斯帝国历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变源自1991年之后原苏联各地档案馆的开放。学者们能够展开他们通常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才能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一进展与整个欧美历史学界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相结合，促使第一代学者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一代学者中的大部分来自美国。他们有的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的前往塔什干，有的前往阿拉木图进行档案研究。他们探讨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身份和宗教政治、贾迪德运动、伊斯兰改良主义等，而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文化问题。我要说的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很少也不愿去关注国家机构史、军事史和外交史，当时欧美学界的潮流并不关注这些议题。在我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我很想知道沙俄当局是如何在中亚征税的。但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我只能自己探索。然而，在南亚历史领域，相同的问题可以通过查阅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典著作来了解。这一情况我认为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已有所改观，物质层面的历史研究开始复兴。可能是因为苏联历史学界关注的主题几乎都集中在物质层面，上世纪